

技术变迁下媒介文化哲学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技术文化的视角

刘卫东

摘要: 传媒技术变迁及其全球化表征,为解决不同国家社会经济差异提供了可能,并已经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新世纪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重要途径。然而,在传播一体化的今天,伴随传媒新技术变迁的深度融合,在促进本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传媒技术挟裹下的外来文化,很可能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异化影响而日益丧失其独立性。若放弃传媒技术迁移,又可能失去发展机遇。本文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文化思想和“技术——文化体系”理论,通过对传媒技术文化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分析,探索上述传媒技术迁移所体现的深层文化哲学问题。

关键词: 传媒技术变迁;媒介文化;普适性与特殊性;技术文化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06.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8)01-0137-0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1.016

—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结构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对工业文明及其技术的全球性扩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市场的国际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并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P680)}作为全球化的技术推动力,传媒技术变迁及其全球化表征,为解决不同国家社会经济差异提供了可能,并已经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新世纪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传播一体化的今天,伴随传媒新技术变迁的深入,在促进本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传媒技术裹挟下的外来文化,很可能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异化影响而日益丧失其独立性。而放弃传媒技术迁移,又可能失去发展机遇。这种现象反映了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文化是人类在探索自然规律、适应社会规律以求生存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全部印记及其表征。它包括有形的器物文化形态,也包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制度规章等无形的精神创造。因而,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分为器物、观念、制度三个文化层次。如果将传媒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文化体系考察^[2],可以发现,其自身既包含了有形的技术文化形态,如印刷术、无线电技术、网络技术;也包括无形的传播理念和传播体制。因此,可以将媒介技术划分为传媒器物文化、传媒观念文化和传播制度文化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构成了传媒技术文化体系的核心内涵。传媒技术文化是指由若干

作者简介:刘卫东,政治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相互关联的媒介文化形态构成的传媒技术系统。传媒技术在社会实际应用中表现出普适性与特殊性两大特征。传媒技术文化也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传媒技术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分别是指，所有的传播技术本质上都具有的共性和每一个传媒技术所具有的个性。传媒技术普适性具有以下基本特点：（1）所有的传媒技术在器物文化层面上都具有效用即有用性，又具有正负效应及其中立的工具性特征。传播技术可以为任何人所使用，在使用后果上具有“双刃剑”的两种效应。（2）传媒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操作使用可以用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传媒技术设备的制造与操作规程具有普适性。例如，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数学家申农所创立的信息论通信模式，既可用于解释古代人类的信息传播，也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复杂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基本原理。（3）传媒技术规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和交流方式。例如，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人类生存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新闻、电子邮件、远程教育、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虚拟现实空间及网络社区等，使人们的一切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媒技术使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最典型地体现在，它无限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整个世界物质、能量、信息、事件及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普遍联系的实现，要求思维真正突破时间、空间、文化、民族等的界限，使‘全球脑’、‘全球意识’、‘全球思维’成为可能。”^{[3](P273)}

传媒技术的特殊性具有的基本特征：（1）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需求，创造出不同的传播技术。中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技术，既有以草木为原料的技术方式，也有用破旧的布帛为原料的生产方式。而印刷技术在中国和西方更是产生了不同的发明和制造方法，其社会文化需求的差异，使印刷技术出现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命运。中国元朝王桢发明泥质和木质活字印刷技术。而欧洲的谷腾堡却使用铅字铸造字模。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发明早于西方近四百年，但社会普及程度却远不及西方。谷腾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后，仅仅五十余年，欧洲就出现了上千个印刷所。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一本书的民族”，印刷《圣经》的社会需求量，成为欧洲印刷技术普及的主要社会动力。而在中国，书法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作为一门艺术，书法在科举考试中也是考官衡量考生学识、能力和才华的重要依据。（2）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传媒器物文化以不同的意义。中国古代的邸报是当时人们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而在今天，收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中国唐朝的进奏院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形态，被现代人视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3）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传媒技术、媒体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按不同的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和运行规则划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传媒及其传媒技术的管理有很大的差异。当今世界，有适应私有制社会形态的传媒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也有适合于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媒介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还有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其他管理组织和模式（如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介行业组织、行业自治管理体制、政党和政府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等）。（4）社会不同阶层和类型的人们对传媒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例如，在网络传播主体中，网民注重传播技术的宽带和网速带给自己的实际效用；而网络管理者和网络技术专家则更关注如何解决网络信息管理的社会效益与积极效果问题；网络经营者则侧重于其经济收益。从对传媒技术的评价看，法兰克福学派对传播技术的工具理性忧心忡忡，与技术决定论者乐观地展望传播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见，传媒技术在其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上都具有普适性又具有特殊性，是普适性与特殊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1](P605)}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则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的基本原理相适应。传媒技术的普适性既与其本质有关，也与其传媒技术使用者对它的普遍认同有关。传媒技术的特殊性则和其所处时代、所在地区的“特定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背景对它的自然选择、文化选择有关。例如，数字式照相技术更适

合于常温地区使用，而在摄氏零下 30 度的条件下，数字式照相技术就无法启动。

由此，得出结论一：传媒技术在本质上具有普适性，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前者是基础，是潜在的，它使传媒技术迁移成为可能；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是显在的，它影响传媒技术迁移的方向和效果。

二

从狭义上讲，文化的普适性源于人类的共同特征。以传播艺术和传播科学为例，产生于西方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演讲术，揭示的口语表达（传播）的艺术，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价值。而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东方智者孔子对人与人的交往（传播）规律，也与古希腊的亚翁有着惊人的相似。诞生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美国的传播学，不仅在西方迅速传播、发展，在中国和东方各国也展示了它强劲的科学影响力和学术生命力。即使受到不同民族文化思想影响，人们在传播科学研究理念及其方法、科学价值观和科学制度方面，也存在共识。在技术文化系统看来，广义文化，即由器物、观念和制度三个层次所组成的文化，都具有普适的效用性和审美价值。任何传播器物文化均具有实用价值和自身的审美意义。任何传播观念文化和传播制度文化的普适性，也表现了符合某一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传播秩序和规范共同追求，即所谓“文化共性”。例如，任何人都离不开传播和交往而离群索居，都有“交际天性和远方崇拜”心理。同时，“任何文化在系统结构上都是由信息源（文化环境）输入（出）、信息通道和控制中心等因素组成。在功能上，都依靠组织、制度和管理政策来实施，在发展过程中，它都遵循着酝酿、孕育的由‘潜态’到‘显态’的发展规律，都普遍存在着矛盾性”^[4]。在传媒技术领域，这种“文化悖论”，表现在为了追求传播行为的“生态平衡”，使媒介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有序，人类在一定的传播观念的指导下，创造了各种传播制度，它既规范了人们的传播行为，协调了人际关系，却又使人们受控于传播制度规范的约束。

同样，文化的特殊性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虽然人们掌握着相同的传播技术，但在传播理念、传播制度、传播意识形态等方面则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即便是同一种传播行为，中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和西方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在探索动机、航海技术、地理资料积累和对未来科学的贡献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5]。传播科学在不同国度和民族中的不同命运，对其特点、规律和技术的不同运用，以及中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等都表明，传播学研究也是具有其特殊性的；此外，虽然从民族信仰上讲，宗教文化具有普适性（即都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观），但不同的宗教文化又各自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甚至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因此而发生摩擦和冲突。文化的特殊性来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的自然选择、社会选择的作用，关于前者，马克思曾有论述：“土壤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社会方式趋于多样化”^[4]；文化人类学家施本格勒更有极端性的论述。他认为，自然环境制约着文化主题的心理意识、价值取向、行为及生活方式，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模式和进程，成为规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外成规则”。此外，地理隔离也是形成文化特殊性的原因之一；关于后者，以人种隔离为基础的社会隔离（如语言、社会制度、战争等）和心理隔离（如民族、性格、思维及生活方式等）使文化具有特殊性。此外，文化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例如，西方文化在希腊时期（以科学艺术为主）、罗马时期（以法律政治为主）、中世纪时期（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以及近代（以科技和经济为主）等不同时期各有其特殊性；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企业组织及管理制度、文化发展模式、民族性及价值观、哲学、宗教等。这里不再赘述。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化的普适性也具有时代性，如封建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虽然具有超时代的普适性，但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又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和区域

性（如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虽然具有超区域的普适性，但相对于印度和西洋文化圈来说，它又具有区域特殊性）。同样，文化的特殊性也具有超时代和超区域的普适性，因为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都具有不以时代和区域的不同而变化的，而以纯粹的文化共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也正因如此，传播学虽缘于西方和美国，但它却能被传播到中国、日本等东方各国。

由此得出结论二：上述可见，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普适性，是潜在的；文化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如先进和落后等），是显在的。前者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后者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方向和效果。

三

前面考查了传媒技术和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这里来分析“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与特殊性问题。“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是指，所有的“传播技术文化”系统都具有的共性或相通性，其特殊性是指每个“传播技术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个性或相对独立性。它主要取决于上述传播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一个“传媒技术文化”系统而言，传媒技术的普适性与文化的普适性相协调，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表现出普适性，成为传媒技术迁移的基础；传媒技术的特殊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相协调，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又表现出特殊性，成为导致文化摩擦的重要原因，也决定着传媒技术迁移的方向；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性与传媒技术、文化的特殊性相矛盾，又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特殊性。即是说，当该系统与其他系统发生交流时，它表现出潜在的普适性（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和显在的特殊性（相对独立的现实性）。就两个相互交流（通过技术转移）的“传媒技术文化”系统而言（现以 A、B 两个系统，并假设 A 向 B 转移为例），它们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将发生如下变化：一方面，在技术、文化普适性的作用下，A 系统中的传媒技术器物被率先转移到 B 系统中，并与该系统中的文化方向并存。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末，封闭的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西方国家先进的传播技术（传媒器物文化）大量引进国内。然而，当 A 系统中的传媒技术文化制度及其媒介承载的意识形态被转移到 B 系统中时，由于西方国家媒介文化受本体系统中的文化特殊性的影响，其传媒技术文化也具有特殊性，因此，它们便与 B 系统中的传媒技术管理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相矛盾，促使 B 系统发生传媒技术和传媒文化变革。如果变革成功，那么，B 系统中的传媒技术、传媒文化就将变成与 A 系统中的传媒技术、传媒文化相近的性质，即促使 B 系统由原来与 A 系统相对的特殊性转变为与之相通的普适性，即普适性由“潜态”变成“显态”，特殊性由“显态”变成“潜态”。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6](P591)}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变革（迁移）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传媒器物文化层面。正如 D. 波普尔所言：“所有社会都将通过现代化过程变得越来越相似”^{[7](P114-115,637)}。例如，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西方先进的传播技术引进大陆传媒业界，较早的是平面媒体的胶版印刷技术。当时的《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均采用进口的印刷设备，甚至印刷的油墨也是和设备配套引进。其后，较大规模引进的是黑白和彩色电视接收机生产线和发射、播出设备。80 年代中期盒式录音设备和录像设备大量引进。90 年代初，摄像机微型化，并逐步推广。90 年代末到新世纪初，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伴随着卫星通信、数字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多功能媒体和全功能媒体（即光电脑控媒）也逐步进入家庭。传媒器物文化的迁移过程几乎是无障碍的态势。伴随传媒技术迁移，以及大陆各行各业技术文化的迁移，使得中国步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从国外情况看，古代日本因一直转移中国的“技术文化”而表现出东方技术、文化的特点。但是，到了近代，日本转而引进西洋的“技术文化”。起初，日本积极地转移西洋的技术器物，但是，当转移西洋的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时，双方因受各自的特殊性作用而发生了矛盾。结果，通

过实施明治维新这场文化变革，使得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东方“技术文化”，接受了西洋近代“技术文化”，开始了近代化^[4]。另一方面，B系统根据本系统特殊性的要求，对A系统的传媒技术（器物）文化、传媒技术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创新，使之民族化。其结果，使得A系统中的传媒技术、媒介文化和B系统接近或相统一，促使B系统又从原来与A系统相通的普适性转化为与之相对独立的特殊性（普适性由“显态”变成“潜态”，特殊性由“潜态”变成“显态”）。例如，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传媒技术（器物）的引进已经使中国大陆新闻与大众传播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从媒介拥有量来看，已经是世界第一。在传媒技术引进的推动下，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需要，大陆新闻传媒机构和从业人员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传播理论和传播观念的变化来看，人们对新闻和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认识已逐步趋于科学化：不仅报纸是一种特殊商品，新闻信息也具有商品属性，报社、电台（电视台）、通讯社也具有产业的性质的观念，已经走出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的狭小天地，逐步被新闻界同仁所认同；中国的报业结构已从单一的各级党委机关报，改变成为以党委机关报为主，各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生活、艺术、体育等专业报纸并存的多元化格局；电台、电视台也从国家经营、统一管理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国家电台与民营电台并存的竞争局面；新闻与大众媒介正由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向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软实力”、又是经济建设中一支有着强大潜力的产业机构转化；新闻传播的内容、媒介自身结构、经营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and 变化。中国大陆新闻与大众传播业已完成了传媒技术（器物）的变迁。虽然大规模地引进国外的传媒技术设备，但并未机械照搬，而是通过“创造性模仿”实现了传播技术的现代化更新与改造。在传媒观念更新和体制改革方面，已经闯出一条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价值体系的经验之路。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到2016年为止，中国大陆的各种媒介集团已有近百家，广播电视电影集团30余家^[8]。尽管中国大陆传媒业在传播技术、观念、制度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制约其全面、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比如，目前，传播体制滞后仍然是制约中国大陆媒介融合和产业运营的主要障碍。传媒体制改革既具有其他方面改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更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事关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体制相对滞后的主要表现是：传媒公共服务体制进入转型期，而传媒自身的角色未能同步变革。一是责任主体不明，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虽然列入社会服务目标，但现行服务体制并未赋予其作为责任主体相应的责任、义务、权利和资源。二是市场机制缺位，投资主体单一。三是事业主体与市场运营主体混合，导致传媒公共服务主体与市场运营主体一身二任，不同程度地发生冲突。总之，当前，中国大陆传媒业改革已经从传媒技术文化层面向制度和体制层面的深层次推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性特征将由“显态”转化为“隐态”，具有中国特征的传媒技术文化特殊性，将由“隐态”转化为“显态”形式。此外，从国外情况看，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文化变革，虽然大规模地引进西洋“技术文化”，但未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殊性要求，经过创新，使之民族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技术文化”^[4]。

由此得出结论三：

1. 上述过程是在传媒技术转移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两个阶段，即传媒技术（器物）文化迁移在先（即超前迁移），传媒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迁移在后（即滞后迁移）。
2. 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如果A、B两个系统的迁移是单向转移（如上所述），那么，受方系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发生显著变化；如果A、B两个系统的迁移是双向迁移，那么，这两个系统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均发生变化。
3. 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传媒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适性与特殊性上所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来实现的。

4. 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传媒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适性和特殊性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既有普适性又有特殊性，是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不能盲目地夸大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5. 在传媒器物层面上进行传播技术迁移时，“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呈显态性）大于特殊性（呈潜态性），开放性大于封闭性。但在传媒制度层面尤其在观念层面上进行传播技术迁移时，“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特殊性（呈显态性）大于普适性（呈潜态性），封闭性大于开放性。

四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时候，特别重视经济规律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他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10](P42-43)}同时，这种社会制度形式及其组织，由于其自身的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11](P190)}。在传媒技术迁移中，接受方系统虽然受自身普适性的影响积极吸收对方系统的传媒技术和文化，但因其又受自身特殊性的影响而不会一味地全盘引进。即使在本系统中实施文化变革，也不会最终被对方系统所同化。因为接受方系统会根据本系统特殊性的要求，对方系统中的传媒技术、媒介文化实施民族同化，使之符合本系统的要求，最终成为本系统中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在进行传媒技术转移时，既不会导致本民族或国家传统文化的崩溃，丧失独立性（这是由系统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不可能只吸收外来传媒技术而拒斥其文化（这是由其系统的普适性决定的），而是既要积极地实施文化变革促进传媒技术的“健康”迁移，又要实施传媒技术文化的民族化过程，以保持自身的特色或相对独立性。“传媒技术—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传媒技术迁移必然导致文化摩擦，但不会最终导致文化异化。这是因为，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接受方虽然通过实施文化变革，接受授方某些文化体制和观念，并改进自身的文化，但这充其量只能变革自身的文化观念，决不会完全根除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更何况，“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9](P600-601)}那些曾经作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虽然被迫实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在观念层面上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依然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传媒技术文化迁移之路表明，当代中国并没有由于外来文化观念的进入而产生传统文化的衰弱，相反，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其走向世界的路径，以自身独特的“软实力”，在西方国家文化中发挥着补偏救弊的作用。因此，应当防止片面强调“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性而忽视了其特殊性，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消除对外来文化的恐惧和排斥心理，从而促进传媒技术迁移与实施。另一方面，如果传授方企图凭借武力来达到使接受方文化异化的目的，则更是一种愚蠢的野蛮行为，如某些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武力征服，非但达不到目的，最终导致全面失败。总之，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文化哲学视角看，传媒技术迁移决不会产生文化全盘异化，这是由“传媒技术—文化”体系的特殊性决定的。文化异化消除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的多样性是技术发展的源泉，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技术—文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关系理论，要求迁移者既要通过促进传媒技术迁移，实施文化变革，实现文化的一体化交流，实现世界各民族“传媒技术—文化”的共同发展；又要通过实施传媒技术民族化过程，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

性，从而达到文化的一体化传播和多样化的交流，使每一个民族文化既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也要具有全球化的共享魅力，达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当代中国为世界体系治理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方案，再一次证明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全球文化多元共赢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张明国.“技术—文化”论[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6).
- [3] 常晋芳. 网络哲学引论[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 [4] 张明国. 论“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J]. 人大复印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00(7).
- [5] 夏劲,陈茜. 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背景下的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比较[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4).
- [6]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美]D·波普诺. 社会学(下)[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 [8]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 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R].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9]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On the Cultural Philosophy of Media in the Technology Change from the Angle of the Technology Culture of Marx and Engels

LIU Wei-dong

Abstract: The changes and the global attributes of media technology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isparit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have also bee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which i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catch up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new century faster. However, in the days of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following the deep changes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 external culture bound with the media technology will probably dissimilate the native national culture and make it lose independence while accelera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very special cultural system, the phenomenon mentioned above reflects the deeper cultural problem in the changes of media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is seeking and proving the true-or-false problem in that cultural dissimilation phenomenon through studying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media technology culture.

Key words: change of media technology; media cultur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echnology culture system

(责任编辑 刘传红)